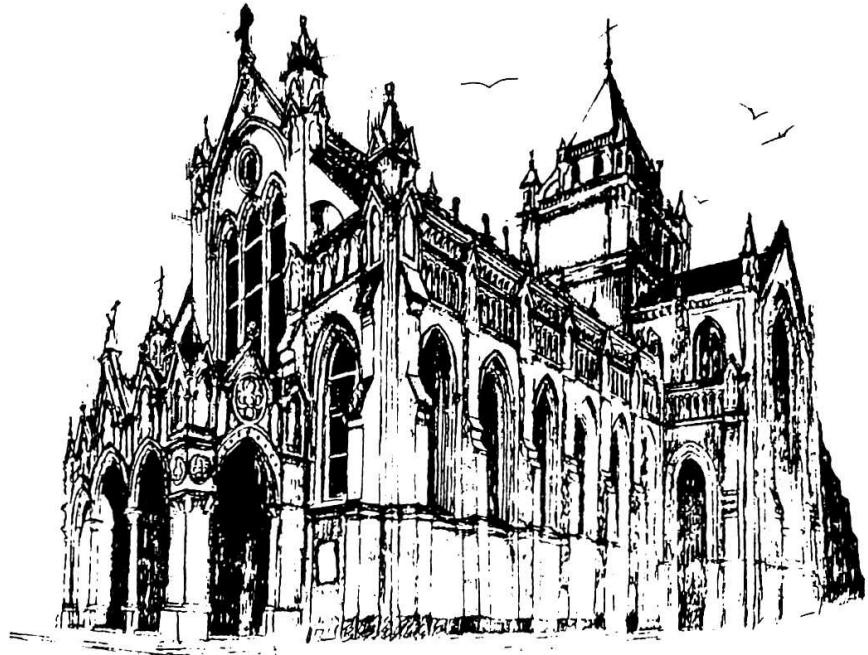


香港天主教



艾巧智著
游麗清譯



(於一九八四年十月廿六日為耶穌會士在
香港所舉辦的講習會所發表的一篇演講)

不足一百五十年歷史的香港天主教，以教會標準來衡量，是一個相當年青的教會，她的成員絕大部份僅屬第一代或第二代的基督徒。雖然她這麼年青，但她所肩負的制度和組織，却比得上任何一個較她長十倍歷史的教會。同時，不但在教友成員上，而且在華籍司鐸、男女會士、以及具備資格的教友領袖的數目方面，香港教區已是現今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華人教區。然而，這個年青、龐大、充滿希望、並且具有規模的本地教會，現正面對着外來的獨特挑戰，遭遇到很多

要反省的問題的衝擊；香港教區正處於一個新時代的門檻上，面臨抉擇。

香港：一段充滿危機的歷史

面臨危機，對香港教會來說一點也不稀奇。她一向關心香港市民在社會及精神方面的福利和需要，分擔他們的歷史——一個危機不斷重現的歷史。大屠殺的瘟疫和蔓延的疾病標誌着我們的早期歷史。（紀錄顯示，

當時的傳教士壽命平均只有三十八歲。)至今仍磨折我們的颱風及火災，昔日是厲害地蹂躪我們，造成嚴重損失，因為當時尚未有防風站，而屋宇也只是木造成的蓆棚。老一輩的市民，對日本佔領香港的那段恐怖時期，至今印象猶深；當時饑荒遍地，藥物全無。此外，常有難民潮，有時數目不多，有時則大批湧來，他們對經已緊張的社會結構的威脅，均可造成傾覆的危機。這一切災難，以及尚未列出的其他災難，都對香港人及教會造成重大的衝擊。教會除了上述的危機外，還有她本身的一些危機，因為直至一九五〇年為止，教區有九成地域是在中國大陸之內。由於清末至中共取得最後勝利期間，內戰連綿，造成社會動亂不安，故此，間歇性和不同程度的迫害屢屢發生，有時遭受輕微騷擾，有時遭受嚴厲禁制，造成教會一切活動停止。隨着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寶安、惠陽、和海豐監牧區的一萬名教友，便與教區的其他部份失去聯繫；教會產業被充公；教堂、傳教站、學校和診療所被關閉；修女被解散，大部份神父被囚，而所有外國傳教士則被逐出境。教會當時似乎是無法生存下去。

我之所以重提昔日傷痛事件，目的只在叫人注意，危機是我們歷史的一部份，而歷史亦昭示我們，香港市民和教會常能應付一切挑戰。我們應謹記這點，因為它可以帮助我們把目前的動盪情況置於適當的觀點上，并肯定香港人可以適應轉變，有能力克服危機。

香港的現象

我們習慣視香港的急劇發展為現代社會

的現象，但事實上，這是她自成為殖民地以後才具有的特色。一八四〇年，荒蕪的香港只有一千五百人居住。到一八四一年終，人口已激增十倍，各種發展迅速展開；在不足三年的時間內，移山填海，道路縱橫，公共設施、私人樓宇及商業機構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以應人口急劇增加的需求。這種發展至今仍然持續，並無衰退。

成千累萬難民的湧入，以及下層結構的發展，推動着這已經令人觸目的海港，使它一變而成工業大城。若以每日十二小時工作計算，在一九八三年內每一天，香港平均每七分半鐘便建造一層公共樓房；這個例子足以說明，即使在今天，發展仍十分迅速，而這個數字尚未包括私人樓宇的建造在內。

現在，香港人口超過五百五十萬，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約五千人。它所擁有的貨櫃碼頭在體積上排名世界第三位，而在吞吐量上則居世界第二位。它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僅次於倫敦和紐約），也是全球重要的商業、手工業及通訊中心之一。為一個沒有任何資源的地方來說，這些都是令人觸目的成果。

五十與六十年代的香港教會

五〇年代及六〇年代期間，香港教會要面對三件艱巨的工作：難民問題，人口激增，以及迫切需要地方以供發展。

隨着中國內戰的結束，大批的難民從中國大陸湧來香港，他們衣衫襤褛，身上一無所有，只帶着痛苦的經驗和傷心的回憶。教會於是捲入難民救濟工作中，設法解決他們的基本急需，包括：向海外求助，設立診所

及福利中心，招募及訓練人才，以減輕他們的困苦。總之，難民在那裏，教會也在那裏。

與難民問題出現的同時，教區亦要負起照顧成千上萬的慕道者的艱巨牧民工作，因為很多難民都來到堂區及教會機構要求學習道理。教區付出很大努力以解決這些牧民上的需要，例如：招募並訓練傳道員、動員一些善會（特別是聖母軍）去幫助培育這些新教友。對教區來說，這幾年是「豐收年」。於一九五七年，皈化者數字由以往平均每年一萬人躍升至一萬六千一百六十九人的巔峰情況。雖然有部份新教友是「米飯教友」，但無可置疑，今日教區內很多虔誠投身的教友都是在那個時期內領洗的。

教區要面對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地方」的問題，包括：為這些空前急劇增加的新教友提供崇拜的地方；為教育他們年青的一代而提供學校；為解決實際的急需而提供醫院及診所等機構。由於地方缺乏，經濟不足，以及需要迫切，這確是一項艱巨的工作。

六十年代中期至 七十年代末期

在迅速發展期之後，教區便轉向「鞏固」方面努力。新一代的天主教徒需要接受信仰的培育，學習負起基督徒應有的傳教及社會責任。同時，教會亦不能忽略她自己的首要使命，就是接觸非基督徒，繼續在社團中傳揚福音。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結束後，教區需要在堂區及教區層面上推行大公會議的指示。這一點便要求大量的組織和預備，起碼爲了徹底從拉丁文禮儀轉變爲本地話禮儀，便

需要預備中文經本，而這項工作不但費時，而且必須嚴格執行。

爲了根據梵二的精神去檢討教區的生活及工作，也爲了替教區的未來發展奠下鞏固根基，香港教區第一位國籍主教徐誠斌於一九七〇至七一年召開了教區會議。這是教區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徐主教的開幕詞很清楚地說明會議的目的：「我們必須來個大檢討——檢討我們的工作、組織、方針，衡量得失，自我更新，趕上時代。」

經過十六個月的積極籌劃，教區會議終於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五日正式開幕。由教區各階層選出的四百名代表劃分成十二個工作小組，他們在超過十八個月的時間內定期聚會，撰寫與教會生活各方面有關的草案，由福音傳播至教會的社會使命都包括在內。最後修訂完成的文獻還附有具體建議，爲教區提供路標及架構，助她邁向歷史的另一階段。

這段時期亦標誌着教區及香港本身的迅速發展。一九七七至一九八〇年間，有超過四十萬人從中國來到香港，而很多大型屋邨及新市鎮亦差不多於一夜之間興建起來（這些新屋邨及市鎮的人口從十萬至五十萬不等），因此教區必須應付人口的急劇增加，并設法以某一種形式臨在於這些新區中。政府的新政策使教區很難在新區中建立獨立的地方以供宗教活動之用，故此，教區必須與老百姓在一起，分享他們的環境、希望和抱負，在社團中給他們提供服務，協助他們培養出歸屬感，支持他們努力應付新環境。由於購不到地方，也租不到辦事處，教區只有在這些新區內負責管理更多更多的學校和社會服務中心，俾能有一些活動據點，真實臨在於她自己的子民中。

目前的情況

要評估教區目前的處境，我想先從她的問題和弱點說起，然後才談談我們本身的實力，以看出香港教會有什麼希望和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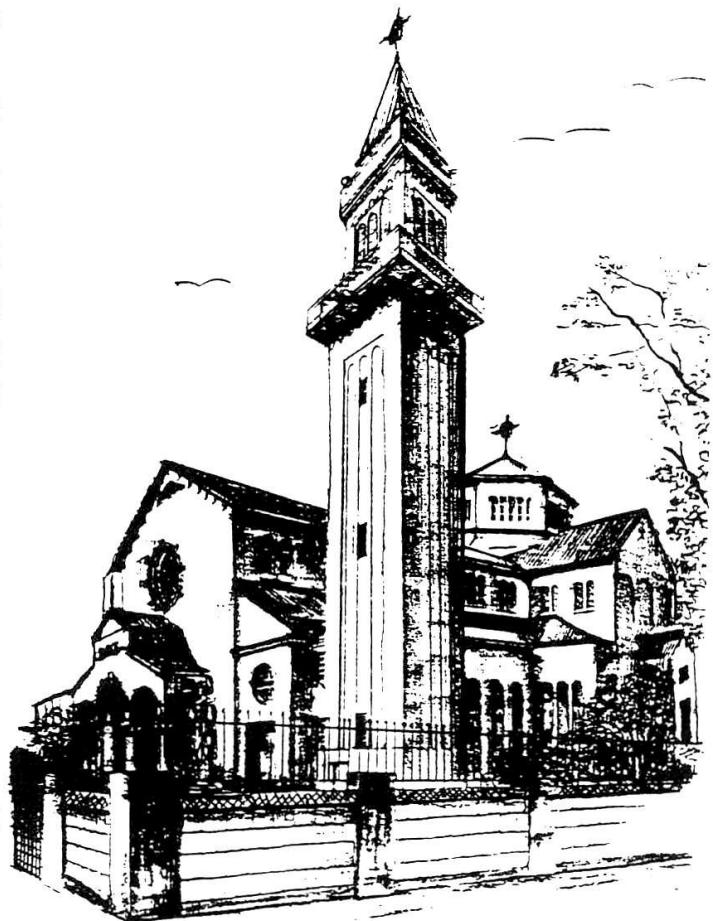
教區所積累下來的組織和制度是主要的重擔；這些問題有些源自內在的需要，有些則是為了順應當地的特殊需要而加在我們身上。姑無論它們的成因何在，它們至今依然存在，并且逐漸使教區產生一種盤據權力和聲望的形象，因而很容易與旅途教會的形象互相背馳。我們雖然並不打算這樣，但由於我們過份依賴這些組織及制度，故此，這些組織和制度對教會傳播福音的使命，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有所妨礙。

與制度問題相連的是本地化問題。香港教區雖是一個地方教會，却未完全本地化。外籍人手的臨在及影響力依然太過強大；不同文化所產生的豐碩影響確是一件瑰寶，但亦能妨礙本地神職負起領導的角色及更完全的參與。這點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到：為何在把中國文化及其價值整合於教會的社會及禮儀生活上，本教區進步得很緩慢。本文稍後詳論一九九七問題時，將會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在教育方面，我們確實太過投入。教區缺乏具備資格、肯於獻身、以及富有福音精神的人手，以致很多天主教學校虛有其名，屢屢把傳播福音及給學生灌輸基督徒價值觀的機會都失去了。

統計顯示，最近參與主日彌撒的教友大幅下降（由六十年代末期的百分之七十下降至八十年代的百分之三十），估計可能是受到以下因素影響：人口的經常遷移、消費社會中的物質主義的嚴重影響，生活方式與家

庭制度的改變、五十及六十年代大量領洗的教友並沒有接受足夠的培育及信仰整合、很多新一代的教友對信仰無知、冷漠、甚至不堅定。姑無論原因為何，數字下降却是事實，這是特別引起堂區關注的事實。與此同時，堂區也要應付自身的嚴重問題，因為大多數的堂區實在太大了，以致無法使成員產生歸屬感。堂區往往只是主日聚首一堂的地方，缺乏人與人之間彼此的交流。這樣的堂區當然不可能使教友成為具有基督徒特質的團體，也不會有機會彼此深入分享經驗，無法恒常互相支持。這點可使我們了解到，為何我們不能或不願意善用所有成員的能力、才幹、及專業知識，以及為何我們沒有開發本地人材的豐富資源。



以上所開列的問題及弱點尚未算全面，我還想提多一點作為總結。我以為，作為一個教區，我們顯得不大願意在社會上擔當起更積極的先知角色。我們是否有點缺乏痛斥時弊與伸張正義的道德勇氣？難道我們不能運用更多道德權威去影響我們的決策者，以及發揮更多倫理力量去糾正錯誤，改善居民的生活質素嗎？我本人相信，我們是能夠做得到的。

充滿希望的徵兆：前景

任何對本教區有所認識的人士，都不能不對她的前景表示樂觀。聖神在我們之中工作的標記，著實多得很。這裏，我只欲指出一些較為明顯的情況。

今日教區愈來愈醒覺到自己在社會上要擔當的先知角色，領悟到要透過不斷的自我皈依和自我更新，去加強自己的信仰，也深知要不斷保持朝氣，追上時代，俾能有效地宣揚福音。從大批神職人員和教友對避靜、學習營、研討、以及其他更新活動所表現的濃厚興趣和踴躍參與來看，便可充份證明教區成員對神修的醒覺。

另一個積極的時代徵兆是：愈來愈多普通教友願意犧牲時間以加深自己對信仰的了解。他們這樣做，不單是為了充實自己，同時亦想更有效地把福音傳給別人。每年，教區教理中心的夜班兩年制課程有超過一百五十人畢業，他們分別來自社會上不同的階層；此外，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亦為五百至六百位教友提供全年長的夜間神學課程。這些事例都清楚顯示出，不但有大批教友願意增進自己的宗教知識，而且他們願意充實自己，以便更能負起傳福音的使命。

成年慕道者數字的上升也是另一個使人振奮的好徵兆。過去五年間，成人領洗的數目雖仍保持不變，但成人慕道者的數目却增加了差不多一倍。更重要的是：這些新皈依者，都是在香港不安、憂慮、和前途不明朗的特殊情況下加入教會的。由於他們生活在高度競爭的社會中，工作繁忙，空暇時間無多，故此，他們在慕道過程中要克服很多困難。我深信，如果我們能採取更積極的態度去傳福音，並且善用我們的機構、社會及宗教服務、以及每天跟各階層人士的接觸去傳福音，則領洗者將會更多。

另一個充滿希望的徵兆，就是教友牧職逐步在堂區浮現。很多堂區已經擁有或正在準備教友去擔當讀經或協助施行聖事的職務。如今，當神父不在時，在俗教友派送聖體給病人、領導團結祈禱、或主持禮儀，已是十分平常的事。這種現象的出現並非是因為神職人員不足的實際需要，而是因為愈來愈多信眾了解到他們領洗時所接受了的牧職，就是分沾基督的司祭、王道及先知的使命。

堂區成員亦重新顯得很積極參與堂區的生活和活動。堂區議會負起重大的堂區行政責任，而堂區本身亦提供給教友更多參與的機會，從聖經研討至社區工作都有。值得注意的是，還有很多忠實追隨福音理想的小團體，它們定期聚會祈禱，分享個人經驗，以福音內容作反省，彼此協助修靈方面的成長。

為了鼓勵新嘗試、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以及促進司鐸與教友之間的溝通和了解，很多鄰近堂區正在設法聯合起來，採取一致步伐去解決共同的問題。目前教區已有四個這樣的組合，它們的代表定期聚會，商討問題，分享消息，交流意見，安排一起舉行

禮儀。這種地區性的牧民組合非常值得推許；它能加強有關堂區之間的團體意識，為共同目標而努力。

教區去年舉辦了司鐸更新營，其中一項積極收穫就是能集中教區各層人士的意見和力量，邁向更合一的目標。更新營嘗試透過祈禱、反省和學習去找出教區的優先重點，并闡明我們對將來的目標。有超過一百名司鐸參加；更新營結束時所發表的一封致全港教友公開信，有以下的內容：

我們要致力使教區能有一個長遠的牧民計劃，着重教友和司鐸的培育與溝通，全力建立起一個信仰成熟、服務他人的本地化教會，在旅途中不斷更新，俾能面對未來的轉變，並抱有積極的態度，信賴歷史的主宰——天主。

教會與一九九七： 恩寵的時期

在歷史上從未有過任何記錄，記載共產政府在接管某一國家或地區之前，曾預先知會該地人民，叫他們事先作好準備。過去，人民雖然可以得到若干徵兆及警告，但往往事情發生得如此突然，以致一般老百姓和教會對於所要發生的轉變都無法準備。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的情況就是這樣。

可是，現在香港却有十三年的過渡期；這可說是史無前例的情況，而我們亦幸能有一段時間準備自己去接受這一轉變。雖然，各方面一次又一次地保證不會有很大的轉變，但我相信新的環境必然會帶來某些新的改變，甚至有些是根本的改變。十三年會過得

很快，故此，目前顯然需要計劃和行動，歷史會告訴我們到底我們是否明智地利用了這段「恩寵的時期」。

迎接挑戰

我們首先要面對的挑戰是如何保持團結；這一點為教會的領袖尤為重要。除了在信仰方面要團結一致外，我們亦同時需要採取一致和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新的情況，與共產政權展開對話，並與他們接近及合作。這樣做並不是要妥協或出賣自己。只要我們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而他們亦是真正的馬克思無神主義者，則在宗教信仰的原則上，我們絕不能妥協。不完整的忠貞就不是忠貞。但另一方面，我們應分清楚，不接受無神主義意識形態是一回事，而排斥那接受無神主義意識形態的人又是另一回事。頑硬的態度，不僅會帶來災患，而且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應有的態度。但是，我們可以開放，却不要過於天真；可以交談，却不要失去基本原則；可以為大眾的利益而攜手合作，却不可犧牲自己的信仰和忠貞。在基本的信仰上我們團結一致，而在應付具體環境上又要懷着積極和具有彈性的態度，甚至有時不但為了香港教會及社會的好處，亦為了中國的好處，我們需要犧牲一些不屬於教會本質的東西。現在教會領導層所面臨的問題是：在採取一致和積極態度去面對新的情況時我們是否願意和有能力去保持教會在基本信仰上的合一？如果不能的話，後果將會不堪設想，會帶給教會很大的混亂和無可挽救的創傷。結果，這不僅使教會受害，亦使香港社會及中國受到損害。團結固然很有生機，但亦很脆弱。

不融洽和不睦正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而我們又往往很容易受到這些敵人的進攻和傷害。

目前及未來所扮演的社會性角色

香港的安定和幸福繫於大眾的信心；這信心關係着這個社會的盛衰。香港天主教雖然只代表着少數人，但她透過所辦的學校、醫院、社區中心、以及其他福利機構，對社會有很大的影響。由於她的地位十分引人注意，且又處於這段緊張及不穩定時期，故此，教會內外的人士都注意着教會對目前情況的回應。對未來有利的積極決策，會有助於提高大眾的信心；反之，則會摧毀信心。我們所處的地位雖然微妙，但責任却很明顯。我們面對香港市民，尤其是對工人及中層人士，需要扮好自己的角色；倘若一旦信心崩潰了，則這些人士受害最深。教會面臨最困惑的問題是：將來她如何能夠繼續負起這個社會性的責任，而同時又能保持傳福音的自由？

不僅是挑戰，更是良機。

也許是天意，要我們面對今天的處境。我們的自滿正受到考驗。現在，我們須要深深地反省我們自己、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工作、以及我們的優先重點。我們需要在福音的價值標準下來反省一下：我們是否需要放棄一些多餘的包袱？我們又是否曾經過於依賴有形的架構而忽略了聖神的臨在？我們也許因為受到社會上一般心態的影響，認為沒有什麼比得上「成就」，結果忽略了捨

棄、貧窮和簡樸等基督徒價值觀。

在腳踏實地去注視未來的轉變時，我們要清楚知道，共產國家內的天主教在活動上受到嚴格限制。雖然由於有關當局一再保證香港情況將是例外，故此我們對前境仍表樂觀，但我們也該未雨綢繆，把我們希望的種子植在更深的泥土裏。歷史證明，即使基督徒的宗教活動自由及公開宣示信仰的自由受到剝奪，即使無法藉有形的機構或媒介去實踐他們的信仰，他們仍能在考驗期間以新人的姿態出現，他們的信仰更活潑堅強，對天主和對教會更忠誠。簡言之，我們需要重新發掘「失敗」和「十字架」的神學意義：從軟弱中產生堅強；在歷史過程中，迫害、剝奪、和困難會使教會淨化，賦予她新生與朝氣。因此，在祈禱中精讀和反省教會在受考驗期間的歷史（尤其是中國教會的歷史），不僅有益，而且會給我們帶來新的希望。「歷史是生活的導師」，這句古老諺語至今仍有意義。

未來的宗教教育

毫無疑問，近年來宗教教育的確有了革新。正如本文所提過的，很多成年教友都渴望加深他們對宗教的認識和了解，而教理訓練亦很熟練地配合牧民目標。聖經研讀和禮儀的復興，對傳統的教理講授產生了很大的革新作用。然而，我們要細想一下：當將來信仰不斷受到無神主義的挑戰時，目前所接受的教理訓練可否經得起如此的挑戰？我們大部份的教友都是在慕道班或在中小學接受了起碼的教理訓練而受洗的，而他們的宗教知識往往是初級和不完全的。除了聽聽主日簡短的講道之外，多數成年教友都沒有得到

正式持續的宗教教育，學生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非天主教學校讀書的信徒所懂得的宗教知識，不會超過初領聖事和堅振所需的道理。再者，他們身處的社會，充滿着浮誇和物質是尚的風氣，不但不能支持和滋養他們的理想和靈性生活，反而大大地阻碍青年人精神生活的發展。在此情況下，我敢肯定，無論現在或將來，教會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要尋求適當的途徑和方法去幫助教友，使他們對信仰和教會（包括教會的性質和歷史，教友在教會內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有基本、穩固和清晰的了解。然而問題又是：我們如何傳播這種知識？又如何把這些知識傳達給那些最需要的人？

一九九七： 本地化的催化劑

歷年來，教區的本地化努力都未能與它的穩定發展看齊。無可否認，香港教會成立後第二年，便設立了自己的修院，培育本地司鐸，並很關注栽培本地聖召。教區確實在過去幾十年間，幸運地培育了為數不少品質優良的司鐸，他們都是熱心、對信仰和教會忠誠、並甘心奉獻自己的人。過去四十年來，教區亦毫不計較地送神父們到外地深造。自從梵二之後，教區不斷在禮儀、教理、社會工作、甚至在行政架構方面尋求改善和更新，加速了本地化的發展。雖然教區已經盡了這一切努力，但距離真正的本地化依然很遠。這裏，我想澄清一下，上述說話並無意去找出代罪羔羊，只是想闡釋實況以清除障礙。

本地化進展緩慢的原因很多，亦很複雜。首先，香港教會乃由制度化的西方教會移

植過來，所以不論是在制度上、人事上、環境上，她都難免受到西方模式的影響。一切傳教區的教會亦有同樣的歷史。隨著時間的過去，教區修院培育出不少本地司鐸，他們與外籍傳教士攜手合作，但他們的人數未能超過外籍傳教士，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外籍傳教士的影響。因此，至少在格調上，香港教會的領導層仍富有洋化色彩。

另一個本地化過程中的障礙是神職人員的牧民工作負擔太重。國籍神父自外地學成歸來後便立刻投入忙碌繁重的牧民工作中，使他們根本沒有什麼空餘時間來繼續研究、學習、或反省，無法將他們所學配合當地文化，為中國神學奠下基礎。再加上過去普世教會對這件事情也沒有大力鼓勵。直至梵二之後，充滿西方傳統觀念、術語、文化價值觀的基督徒神學，才開始受到教會內神學家的嚴重批評。不過，傳統西方神學的影響，至今依然十分強烈。

某些教會人士對本地化性質的誤解，亦阻礙了真正的本地化。不少人以為，只要把禮儀的形式改變為本土形式，只要把服裝略略改變以適應本地的需要，便是本地化。其實，真正的本地化並非是編製出來的，更不是由外強加而成的；本地化的發展應當是自發的，應從本地教會本身的生活浮現出來。

在某些圈子裏，人們從十分政治的角度去看教會的本地化，例如：排斥西方文化和外國傳教士，抗拒羅馬的中央集權制和父權式領導。結果，使本地化的推展只是為了「本地化」，而與實際的日常生活脫節。在香港這個東西方文化既揉合又抗衡、既互惠又相損的特殊地方，教會內却有人把文化看成是靜態而非動態的事實，視之如象牙寶塔，故本地化的進程更因此而變得困難。

正當一九九七臨近之際，香港開始把重西輕中的潮流倒轉過來。將來，香港受西方的影響會越來越少，而受中國的影響會越來越多。香港教會的本地化將會加速步伐，以應付在文化、社會、及政治上的新轉變。按教會的本質來看，她既是一個生活在時空中的團體，就必須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中生存和活動，亦必須小心觀察時代的徵兆，并在信仰的光线下適當地行動。現在，我本人想在這裏提供一些實際建議，希望有助於加速本地化的發展。

首先最重要的是，本地神職人員應負擔起領導教區的角色，包括政策制訂、管理、和牧民策劃等工作；而外籍傳教士則應從旁協助，扮演支持和輔助性的角色。

第二，應該盡量鼓勵具備資格和有才能的神父、會士和教友，幫助他們進一步發展一套中國神學，而這套神學不僅植根於聖經和教會的傳承，也揉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價值觀。這種源自福音的中國神學，不但直接與香港人有關，而且亦有助於解決當地的問題。

第三，必須培育香港教友，使他們對本地教會產生歸屬感。這樣，他們才會在經濟上給予教會更大的支持，達成自養的目的，而外來的資助便會逐漸減少或撤除。我認為，教會的自養愈早達成愈好，且任何時候都可以開始。

第四，必須使信友明瞭：積極履行聖洗所領受的教友牧職是信仰成熟的表現，也是本地教會成長的真正標記。我們需要不斷培育他們接受各種不同的教友牧職，以負起傳播福音的全部責任，俾能藉着自己的言語、文化、和神學，把福音傳給同胞。

不論有沒有九七問題的衝擊，我們脫離

太過制度化的教會模式的時刻顯然已經來臨，我們應當選擇或聯合其他教會模式，使我們可以成為：

——一個既保持基督徒的傳統又配合現代生活的教會。這樣的教會可能需要簡化機構，把那些陳舊相因或只為某些教內人士提供安全感的制度架構拋棄。

——一個僕人的教會。為了能夠更有效地服務人群，她必須首先成為上主之僕。換言之，這個教會必須與耶穌基督一樣，活在人群中，與人類團結一致，分享天主子民的喜樂與痛苦。簡言之，教會必須伸開雙手，懷抱及服務社群。

——一個先知性的教會。她必須面對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具體問題，并在社會、精神及倫理等層面上宣揚福音的訊息；堅持真理，絕不妥協；宣揚人性尊嚴、人權、社會正義；肯定精神價值超越物質價值、生活質素高於經濟需要。她是一個既選揀窮人又不漠視其他階層、其他問題的教會。她也是一個雖在晦暗中仍抱有希望，在不明朗的前景中却不氣餒的教會。

——一個自由的教會。她在任何政治壓力下仍保持獨立，俾能作證出：生活中超越的質素遠遠超過我們社會中固有的、唯物主義的、及消費主義的價值觀。

面臨轉變，進退維艱

要獲致上述的教會模式及表像，現行的教區架構需要根本而具體的改變，而目前工作的方式亦需要多元化。誠然，當時間來到，必定有新的架構來取代舊的架構，因為若沒有某些架構，理想始終仍是理想。當然，將來的架構會變成怎樣，尚需拭目以待。當

教會一旦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我們就會面對某些進退維艱的情況，需要認真考慮和謹慎分辨。

如果我們現在就開始簡化制度，放棄若干架構，使工作模式多元化，則人們會否誤會我們，以為我們這樣做是等於反對將來政府的措施，暗地裏杯葛公共政策？

我們在社會的輔助角色，會因管治權即將轉移而引起敏感的反應嗎？我們簡化機構的決策會否被視為在困難時期中撤退的先兆？這種做法又會不會減弱香港人的信心？我們的教友在其生命中已面對過這麼多的動盪情況，又很需要教會堅定的支持；他們對教區的這種決策又有什麼看法？在目前的情況下進行徹底的改變，很易導致他們產生錯誤的推測。

也有一些教友會用十分消極的態度看教會簡化機構的行動，他們推想教會是準備鑽入地下，建立「家庭教會」。

另一個難於取捨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決定使我們的工作多元化和使我們的制度簡化，則我們會在基督徒居住地區失去很多用作教友活動中心的房舍。

此外，尚有一個教會內部要處理的問題，即「理想的基督徒小團體」的觀念。這個觀念有它的冒險性，它會把教會分為許多各自獨立、我行我素的小團體。試問，這些與教會大團體沒有聯絡的小團體之間又如何協調呢？它們又如何繼續對教會的歷史及其使命的普世性開放？如何作證出教會是向萬民開放的救恩標記和聖事？

一九九七： 教會扮演新角色的機會

假如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文能夠落實執行的話，香港教區便處於一個非常有利的地位，可以成為中國教會與教宗之間、以及各個地方教會之間的橋樑。香港是一個理想的國際中心，是學術、思想、經驗及來往接觸頻繁的理想地方。將來，香港也可能成為教會與教會之間展開對話與合作的地方。

香港教區將來所扮演的角色，有賴於中國政府落實執行「一國兩制」的政策。這個政策最後會怎樣發展，目前只能猜測。一個資本主義的城市在共產主義國家的架構內可以成功地運作，而同時本地天主教會又可以自由傳教而無需與教宗及普世教會切斷聯繫，則香港教會就會在一國兩制的條件下，促進香港成為一個更合乎人性和正義的社會。這樣，香港教區可以為了推進社會公益而自由工作，但又不致於淪為任何一種制度的犧牲品。果能如此，她不僅可以向亞洲許多處於相仿環境中的地方教會提供一個新的教會模式，亦可為普世教會提供一項很獨特的貢獻。

